

毛澤東思想  
的新發展

孫一粟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

---

杨 超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责任编辑：邓星盈

封面设计：曹辉禄

**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      杨超著

---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邛崃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10.5插页4字数217千

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

书号：2118·22      定价：2.45元

# 目 录

前 言 .....	1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 .....	5
历史地、科学地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是共同的任务 .....	23
学习毛泽东同志八篇哲学著作的体会 .....	39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和核心 .....	51
坚持毛泽东思想，发展毛泽东思想 .....	73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 .....	95
要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 .....	126
战略转移与实事求是 .....	129
学习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 .....	143
实事求是、恰如其分、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	149
论诸矛盾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原理 .....	182
谈谈工作方法的辩证法 .....	207

执政党的理论建设和作风建设	229
研究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必须研究武装斗争史	261
土地革命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272
统一战线的思想宝库	285
论民主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	297
后记	331

## 前　　言

哲学是各个时代精神的精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无疑，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毛泽东哲学思想继续作为指南，而毛泽东哲学思想更需要新的历史时期赋予活力。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哲学战线上的根本任务，是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所说的：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写出新的“实践论”和新的“矛盾论”。新的“实践论”，可以说是“经济建设论”，它不同于过去的“革命战争论”；新的“矛盾论”，可以说是“人民内部矛盾论”，它不同于过去的“敌我矛盾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到了新发展。这个新发展，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根本特征的，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杰出代表的。这就是本书取名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的缘故。

本书是我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一书的续篇。它补

充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在北京和成都两次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我阐明了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观点。没有机会参加这两次讨论会和得到《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初稿《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同志，从这两次讲话中，大体可以了解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从而成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三、《论诸矛盾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一文，是我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一书出版之后的一点新体会，它弥补了前书的不足。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希望在这块“砖”抛出之后，能引出“玉”来。

四、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民主革命时期三大法宝的哲学概括。对于三大法宝，过去在阐述时有个缺陷，不是把它们当作三门科学看待，因而往往是哲学原理加三大法宝的实例，即不是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作的那样，也不是象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所作的那样。我所作的这个尝试，旨在说明三大法宝本身是三门科学，它们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光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哲学界已经并正在进行许多可贵的研究。我的这些研究，还很粗浅，有待今后深入去做。作为哲学战线的一名老兵，能够有幸参加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讨论“两论”的哲学小组和参加对

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的研究，衷心为之欣然。但是，读者不难觉察，由于将近四十年没有专门从事理论工作，难免有不及专门从事理论工作同志的地方。这就恳切地希望专家、学者们的指正。

关于结合四化建设谈论自然辩证法的文章和讲话，将另行由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概未收入本书。



##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sup>①</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局召开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讨论我写的《论毛主席哲学思想体系》这本书，请接受我的衷心感谢。我参加这次讨论会，受到了很多启发。我这本书，写得很粗糙。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这个题目，是个大题目。我自己没有准备写文章，更谈不上写书。我只是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下来。随着实践的继续必然是认识的深化过程。一个人的认识，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对这个问题是讲得很清楚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根据我的学习体会，核心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林彪鼓吹：毛泽东同志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甚至大搞片言只语。这是荒唐的。因此，我利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期间，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进行了较为完整的、系统的研究。我把书名定为《试论毛泽东哲学思

---

<sup>①</sup>这是作者1978年10月3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局召开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

想体系》，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我从四个方面来谈自己的体会。

首先，讲我是怎样接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我这里所说的，有些是毛泽东同志的原话，有些是毛泽东同志的原意。

我是一九三七年十月才到延安的。到延安以后，我就进了党校。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在批判张国焘的大会上。我当时是普通党员，同毛泽东同志没有个别接触。我接触毛泽东思想，是从《论持久战》开始的。一九三八年五月，我到马列学院学习，当时正在学习《论持久战》这一名著。我从哲学的角度，写了很多学习《论持久战》的墙报稿，谈自己的体会。后来，我把这些墙报稿综合为一篇，送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给我回了信，肯定了我的体会，还说从我这封信中得到益处。这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对青年的关心和鼓励。在延安时我一直保存了这封信，我离开延安去重庆办事处工作时，把所保存的文件都烧了。这封信没有保留下是十分可惜的。毛泽东同志还送了我一本书，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它是《论持久战》的姊妹篇。要我进行对比学习。他还说，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难以在抗战之后十个月就写出《论持久战》这本书来的。这些话是毛泽东同志的原意。因此，我认为要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

持久战》这两部军事著作当作哲学著作来学习。毛泽东同志在这两本书中，是从革命战争角度来讲哲学的，讲的是军事辩证法。当时的革命实践就是革命战争，军事辩证法在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中是很突出的。我虽然兼任过师政委，但是我没有打过仗。我学习军事辩证法，是从这两本书学习的。总之，我接触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从这两本书开始的。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我代替艾思奇同志在抗大讲了一期哲学课。这是在抗大四期讲的，前后约十次左右。当时抗大的学员思想很活跃，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是蛋生鸡还是鸡生蛋。我的回答是：从生物的胚胎的发展来说是蛋生鸡，从生物的物种起源的发展来说是鸡生蛋。这是属于自然辩证法的范围。对同学们提出的这个难题总算应付过去了。我能记住的只有这个问题，其他基本上仍是按照三十年代的哲学提纲那些章节讲的。

一九三九年春，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有六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其余四人是何思敬同志，艾思奇同志，毛泽东同志的秘书和培元同志，以及陈伯达。这个哲学小组，主要是讨论《矛盾论》和《实践论》，也涉及到上述两本军事著作。因此，这个哲学小组也是《矛盾论》和《实践论》的“两论”学习组。据说，现在西方有人企图抹杀“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和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杰出贡献，说什么“两论”不是一九三七年写的，是解放后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才加进去的。我是历史的见证人。怎么不是一九三七年写的呢？如果当时没有“两论”，我们讨论什么呢？后来公开出版的“两论”，当然要对当时的“两论”进行

某些修改，使有些提法更加准确，但是不能说“两论”是解放后才有的。国内也有人说《矛盾论》和《实践论》是从苏联抄来的，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苏联三十年代的哲学界，在斯大林的一些形而上学观点的影响下，并没有彻底的唯物辩证法理论。他们是平列地讲唯物辩证法的四个特征和三条规律，以量变质变规律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规律。而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却是抓住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讲透了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和范畴，同时还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精髓，突出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这怎么能说《矛盾论》是抄袭了苏联哲学界的东西呢？苏联三十年代的哲学界在斯大林的影响下，对于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并没有正确的理解和论述。他们片面地强调对立面的斗争，忽视对立面的统一，甚至只讲斗争、不讲同一。一直到五、六十年代，甚至到现在，他们都还否认战争与和平这种对立的东西具有同一性。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以及其他著作，既讲了对立面的斗争，又讲了对立面的统一，正确地论述了对立面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这怎么能说是从苏联哲学界抄袭来的呢？不仅不是抄袭，而且是截然相反。一个是坚持真正的唯物辩证法，一个是仍然束缚于形而上学的一些观点之中。我们决不能因为某些概念和用语上的难以避免的雷同，而看不到毛泽东哲学思想同苏联三十年代哲学在基本精神上的重要区别。

“两论”的思想早在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就已经有了。毛泽东同志在“两论”学习组经

常讲：问题就是矛盾，分析问题就是分析矛盾。这是原意，不是原话。当时的问题，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策略问题，即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和策略问题。在《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中有七论，但是毛泽东同志当时强调的是实践论、矛盾论，过程论是在讨论《矛盾论》时着重强调的。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过程论的思想都有了，都早已经形成了。毛泽东同志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当时实践提出的各种问题，因此，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以实践理论为基础、以矛盾学说为纲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内容。对这个问题，我是从亲自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中所得到的体会。

哲学界的一些同志认为，我用以实事求是为红线、以实践理论为基础、以矛盾学说为纲来概括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内容或基本特征，不够确切。这个可以研究，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科学，有一个科学的体系，那就应当抱科学的态度，把它作为科学的研究的对象，来进行探讨。我的观点，作为抛砖引玉，期望把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研究开展起来。

## 二

其次，讲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三个时期哲学上争论的中心。

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原来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都有一个发展过程。

要明确这个问题，必须先了解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候，哲学上争论和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列宁那个时候，哲学上争论和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毛泽东同志这个时候，哲学上争论和回答的问题又是什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个时候，哲学上争论的中心是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的问题，也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吸收了它的合理内核，抛弃了它的唯心主义，用唯物主义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是青年黑格尔派，当他们用唯物主义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以后，才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但是，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吸收了黑格尔的合理内核的时候，绝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哲学还直接来源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解放，起了很大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辩证法改造了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从青年黑格尔主义者转变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个时候，从马克思

主义哲学形成一直到《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心都是回答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和意识对于物质的能动性的问题，是联系社会实践的观点来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已经提出了新的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但是他们注意的重心还是物质论，是用社会实践的观点去批判旧的唯物主义的物质论，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论，把一般唯物主义的物质存在决定思想意识的理论，发展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论，并正确地阐述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

到列宁那个时候，争论的中心仍然是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这个问题，从批判“感觉复合论”到批判“物质消灭论”，都是批判唯心主义。列宁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归结为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因此他着重从认识论领域进一步地解决了哲学的基本问题。这里顺便讲一下，西方世界有人提出“反物质”这个概念。为认我不能把特定意义上的“反物质”和哲学上的物质概念混同起来，不然“反物质”概念和“物质消灭论”一样就会是唯心主义的说法。把电子、质子、中子等叫做“物质”，而把正电子、反质子、反中子叫做“反物质”，这里，我不是就科学上的“物质”、“反物质”的概念来论证它，而是说，把这些说法机械地搬到哲学上来，就会搅乱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线。因为既然“反物质”和“物质”相反，“反物质”也就不是物质了。哲学上的“物质”概念，是指独立于人们意识的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在哲学上不加说明地使用“反物质”概念就会走向否认客观存在，这就陷入了

唯心主义。在微观世界中，有中子、反中子，质子、反质子，电子、正电子，中微子、反中微子，等等，这些都是客观存在，其中的反中子、反质子、正电子、反中微子等等也是客观存在，因而也就是说都是物质，并非哲学上的“反物质”，并且正好说明在微观世界中万事万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说明，对于自然科学领域中是否会有唯心主义，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话又说回来，列宁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而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这就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实践观点。

应该这样说，“实践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提出的，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但是更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这是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就发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究竟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出发还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争论的中心就在这里。王明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出发，一概斥之为“狭隘的经验论”。在这里，我要说“四人帮”举起“反经验主义”的破旗，步的是王明的后尘。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什么呢？旧中国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成为一切矛盾的集中点。在十月革命之前，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多少先烈，英勇牺牲，前仆后继，都没有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都失败了。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失败